魏了翁与宋代靖州语言生态考略

赵律言
观筑山河（杭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文化旅游研究院，浙江杭州

【摘要】文章通过还原南宋靖州的社会结构与语言生态，考察鹤山书院的生源构成与讲学实践，并结合语言接触与演变的基本规律，系统辨析魏了翁的语言背景，在其谪居靖州六年期间是否可能对靖州方言的形成产生影响。研究表明，靖州治所汉人极少，苗侗土著为主体，鹤山书院受众多为湖湘江浙流寓士人，对基层覆盖有限；六年谪居应不足以完成语言结构性变迁。更关键的是，魏了翁母语可能为宋元古蜀方言（南路话底层），与以汴洛中州音为基础的通语音系存在差异，本身不具备推广宋代官方通用语言的基础。靖州与四川今同属西南官话是明清移民的晚近结果，不可倒推宋代存在方言同源关系。魏了翁的历史贡献应回归理学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本来语境，不必附会为超出其历史角色的语言影响。
【关键词】魏了翁；湖南靖州；湖广话；南路话；语言接触

A Study on Wei Liaoweng and the Linguistic Ecology of Jing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Lvyan Zhao
Culture and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Guanzhu Shanhe (Hangzhou) Culture and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ecology of Jingzh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examines the student body and teaching practices of Heshan Academy in order to assess whether Wei Liaoweng's linguistic background could have shaped the formation of the Jingzhou dialect during his six-year exile.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Han Chinese residents were few in the prefectural seat, where the indigenous Miao and Dong formed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Those attending the Academy were chiefly itinerant scholars from Hunan, Jiangxi and Zhejiang, and its influence penetrated only marginally into local grassroots society; a six-year exile, it is argued, could not plausibly have produced structural linguistic change. More crucially, Wei Liaoweng's mother tongue was most likely the ancient Sichuan dialect of the Song – Yuan period (with a Nanlu dialect substrate), a variety whose phonology differed substantially from that of the imperial koine grounded in the Bian-Luo Central Plains pronunciation. He thus possessed no natural linguistic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Song imperial standard. The present-day classification of both Jingzhou and Sichuan within Southwestern Mandarin is a comparatively late outcome of the Ming – Qing migrations and cannot be read back as evidence of a shared dialectal origin in the Song. Wei Liaoweng's contributions are best understood within their proper context of Neo-Confucian dissemin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rather than inflated into claims of linguistic influence that exceed his historical role.
[Keywords] Wei Liaoweng; Jingzhou of Hunan; Huguang dialect; Nanlu dialect; language contact

1. 引言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庆元五年（1199 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佥书枢密院事。宝庆元年（1225 年）因党争贬居靖州。前后六年，魏了翁建鹤山书院讲学授徒，完成《九经要义》《周易集义》等著作，对湘学和理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蒋菲，2021）。现关于魏了翁靖州行迹的研究指出，他在靖州的讲学活动，通过书院建设与理学传播，使靖州在文教气象上“无异中州”，彻底扭转了当地“布髽跣足”的原始风貌，确立了“崇文重教，俗尚礼仪”的社会新风尚（尹海江，2010）。

近年来，在地方文旅品牌建设推动下，这一说法得到进一步强化。靖州成立鹤山学研究会，多

次组织研讨考察活动，推进鹤山书院恢复建设，并举办“魏了翁与湘学传承”主题读书会，系统研讨魏了翁的思想源流、主要作品及其在靖州崇文兴教的作为（雷昌仁等，2023）。在此过程中，地方文化研究者提出“魏了翁兼具中州音和西南官话的语言背景，可能对靖州方言的形成存在影响”（千年飞山，2024 年 1 月 3 日）[1]。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士大夫，在遭遇贬谪流放时，虽内心痛苦，但很快投身社会生活，将中原儒学文化资源带入开发程度相对有限的边地，推动地域文化的更新与多族群文化的交融。流官文人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其语言习惯直接成为流放地文教建设的基石（李伟，2007）。因此，这种文化层面的改造，往往最先在语言层面留下痕迹。魏了翁在靖州六年谪居，其语言背景是否对靖州方言的形成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湘西南少数民族边陲地区的整体语言格局?

2. 南宋靖州的社会面貌与语言生态

要判断魏了翁的语言背景是否对靖州方言的形成产生影响，首先需还原他抵达之初的靖州社会风貌与语言生态。

靖州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始由诚州改置，此前长期为“蛮地”，朝廷对此地寄予着“安宁、安靖”的期望。汉人移民规模有限。南宋孝宗朝，围绕靖州的去留问题曾有过争议。陈乂指出靖州“居蛮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输赋”，但同时强调其战略地位——“然为重湖、二广保障，实南服之要区也”（脱脱等，1985）。这段讨论恰恰揭示了靖州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其社会结构确未纳入王朝常规治理体系，与内地州县判然有别；另一方面，朝廷因其军事屏障地位而坚持设治，使其成为嵌入“蛮夷腹心”的王朝前哨。这样一种“羁縻”与“郡县”之间的特殊形态，恰恰说明靖州的汉化程度十分有限。

崇宁中，靖州户数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二。魏了翁在《答苏伯起》中留下了初至靖州的直观印象：“靖为郡百二十七年，布髽跣足之风，未之有改。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盖可想见”（魏了翁，1989）。所谓“布髽跣足”，正是对当地少数民族服饰装扮的实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亦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陆游，1979）。以上史料可以确认两点事实：其一，靖州州城规模狭小、户口稀少；其二，靖州境内存在服饰、族称可辨识的非汉族群，且其习俗长期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魏了翁对当地民风经历了一个从“陋其士，夷其民”到“徐即之而不然”的态度转变。他在《黔阳县学记》中详细记载：“宝庆初，余以罪戾徙靖，始亦陋其士，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盖民不知有纷华之悦，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科举之利，故质实近本。祀事往往用尸，虽功缌亦疏食以终丧；吉凶不以佛老，无塔庙僧牒之耗。郊人犹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间亦莫不然。（魏了翁，1989）”这段记述固然带有理学家“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但也侧面印证：靖州士民与中原科举文化存在相当距离，“不知有科举之利”恰恰说明其并未深度融入汉文化教育体系。

人口规模与交际密度是影响语言接触结果的重要因素（叶蜚声、徐通锵，2010）。“城中不满四十家”意味着靖州治所的人口极其有限，而广袤乡村则“布髽跣足”相沿成习。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即便存在语言接触，其影响范围也必然局限于极小的人群。

3. 靖州鹤山书院的生源构成与讲学受众

魏了翁靖州讲学的盛况，《宋史》本传记载：“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脱脱等，1985）”细读此条，值得注意的恰恰是“湖湘江浙之士”的地域限定——追随魏了翁问学的，主要是外来游学士人，而非本地苗侗子弟。

考诸史料，鹤山书院的知名弟子如叶元老（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的门人）、蒋公顺、滕处厚、高斯得、程掌等，或来自广西，或出自四川，或籍隶江浙。本地学者可考者寥寥，仅有绥宁戴立本、靖州通判江埙等数人。这种生源结构说明，鹤山书院更像是一个流寓士人的学术共同体，其教学活动对本地族群的覆盖极为有限。魏了翁在靖州期间，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对儒家诸经义疏重新编校，在治经学上下工夫，其学术活动的主要对象仍是外来士人群体。

---

[1] 该观点提到的“中州音”是魏了翁作为宋代士人所依循的读书音与通语规范；而所谓“魏了翁具有西南官话背景”之说，实为今靖州地方文化学者依据现代靖州方言归属西南官话这一方言分区直接反向推断而得。

魏了翁本人的诗文亦可佐证。他在《次韵靖州贡士鹿鸣宴二首・其一》中写道：“何处何时不产贤，黔中故地夜郎天。虽云地脉元无間，欲破天荒未有先。”（魏了翁，1989）。“欲破天荒”四字，恰恰说明本地士子参加科举尚属罕见，更遑论语言的深度汉化。理学家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义理之学、心性修养，而非语言教学。即便有本地子弟入学，其习得的内容也是儒家经典文本，在语言主要限于士人阶层的“文读层”，不太能触及基层社会的语言根基。

值得深思的是，魏了翁在靖州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更多体现为双向的文化调适，而非单向的“教化”。他在《答林知录》中自称“居靖二年，士风民俗久益相宜。”（魏了翁，1989），这是外来者对本地社会的适应。到靖州后期，他对当地风物产生情感认同，在《应诏封事》中称靖州“实为乐土”，为“自靖自献之地”，甚至从《尚书》中引申出“自己静心谋划、自己向朝廷诚心贡献良策”的释义。这种态度转变恰恰说明，文化影响是双向的，魏了翁本人也在被靖州的山水民风所“化”。

4. 边地语言接触的条件与限度

宋代的通语，即以汴京（今开封）洛阳为代表的中州音，通行于行政领域，州县官员因异地任职，不少人出身科举，能够说一口中州音（王启涛，2024）。但在湘西南少数民族边陲地区推行率并不高。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渠阳蛮俗”记载：“靖州之地，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峒诚州，……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其风俗夐与中州异。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幕（有的版本为“都幙”），邦人称之曰土官。”其中“都幕”一词源自侗水语支（龙耀宏，1991），足见当地语言仍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中州音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同时也需要考虑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语言的扩散通常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数量的移民人口迁入，二是持续稳定的语言接触环境，三是超越日常交际的制度性推力，如官府行政、科举教育（王恩涌等，2000）。检视宋代靖州，这三者均不充分：

其一，外来移民规模有限。靖州建郡仅百余年，此前长期为“蛮地”。即便到了南宋，城中也不过“不满四十家”。这样的移民规模，根本无法形成语言同化的“临界质量”。日本学者平田茂树在研究宋代士人网络时指出，靖州在当时属于“边缘社会”（平田茂树，2022），其与核心区域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本就有限，遑论大规模的语言变迁。

其二，语言接触的持续时间不足。魏了翁谪居靖仅六年，对于一个地区的语言变迁而言，六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流官文人带来的中原汉语，在南方流放地的语言重构中扮演了“上层植入者”，而非“底层替代者”的角色。也就是说，贬官带来的中原雅音作为高威望的“文教叠加层”，与原本稳固的“少数民族母语”底层长期并存。魏了翁在靖州六年的讲学则从时间维度补充了这一理论的边界：由于接触时间不足（仅六年），流官的语言影响主要局限于士人阶层的“文读层”，未能触及基层社会的语言根基。这种“文白分层”的格局，既体现了中原文化在边缘地区的渗透力，也揭示了语言变迁中“时间”与“代际”的决定性作用。

其三，语言接触的方向性值得关注。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当少数外来者进入多数土著社会时，更可能发生的是外来者的语言被同化。靖州后来的历史发展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据研究，湘西南苗族先民在楚语长期影响下，并未完全掌握楚语，而是形成兼具楚语和苗语特征的中介语（酸汤话前身），其底层保留苗语痕迹，最终成为当地母语。此后历代北方移民虽持续迁入，但江西移民因时间跨度长、居住分散，对酸汤话影响有限，反而逐渐融入当地语言环境（瞿建慧、谢玲，2011）。宋元以降，行政区划统一使北方官话与西南官话共同作用于酸汤话，但酸汤话并未被官话取代，而是融合各方影响，形成语言结构层次分明的混合语（周振鹤、游汝杰，1985）。这一过程清晰地显示，外来语言在土著社会中被本土化，最终融入当地语言系统。如果魏了翁的语言背景真的能通过讲学、著述活动影响靖州一地的语言形成，那么后世出现的可能是汉语对苗侗语的替代，而非多种语言长期共存、彼此交融的格局。

5. 魏了翁的母语背景与方言属性

以上论述主要立足于靖州本地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魏了翁的语言背景在其谪居靖州六年期间对靖州方言的形成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然而，尚有若干关键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1）魏了翁的母语方言性质为何？其与宋代通语之间的语音差异程度如何？（2）靖州现今通行的汉语方言以西

南官话为主，而魏了翁籍贯所在的四川亦属西南官话分布区，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魏了翁是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人。一提到四川成都，首先会想到具有“不分平翘舌、不分鼻边音声母、调值相似、古入声字归阳平”特征的“湖广话”，同时也认为这是主要遍布四川省境内的汉语方言。这是受到了崔荣昌有关四川方言及其历史形成研究的直接影响。他认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崔荣昌，1985）。”在他后期专著《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中说：“我们认为，四川方言，包括四川官话都是外省移民带来的（崔荣昌，1996）。”同时，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蒲江本地方言也被划入西南官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2012）。

但近年来周及徐认为，在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南路话”，在语音、词汇上都有自己的特征，最明显不同于“湖广话”的语音特征是入声独立。“南路话”不是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带来的湖广话在川西南地区演变的结果，南路话应是更早的宋元时期古代四川方言的遗留。根据南路话的特点，应从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中的西南官话中划出，与江淮官话一样，成为汉语北方方言的又一次方言（周及徐，2012）。魏了翁的家乡蒲江，可能属于“南路话”区。这一研究证明，在元末明初大规模移民潮之前的古代四川方言并未完全消亡，四川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并未被“湖广话”截断，而是在岷江以西以南地区保留延续至今。魏了翁在蒲江成长求学的二十一年间（即 1178－1199），他所习得和使用的，可能是这种“元末以前的古代四川汉语方言”。刘晓南对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的系统研究也印证了蜀地方言的独立性：宋代蜀地文人日常通行的并非以汴洛的中州之音为基础的通语，而是音系特征与通语差异显著的地方方言（刘晓南，2004）。魏了翁作为南宋蜀学代表人物，其语音习惯自然受这一地域语言环境深刻塑造。

就今日靖州与四川大部分地区同属西南官话的分布格局而言，靖州通行的西南官话归属湖广片黎靖小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2012），其形成与明代卫所驻军、清代湖广移民大规模迁入直接相关（胡萍，2007）。它与四川境内西南官话呈现的语音共性，本质是明清湖广官话分别向西、向南扩散形成的平行发展结果。

由此可见，一是魏了翁的母语方言可能并非宋代中原通语，而很有可能带有蒲江一带留存的宋元古蜀方言特征，与通语音系存在差异，并不天然具备推广标准官话的语言基础；二是靖州与四川今同属西南官话是明清移民的晚近结果，不能倒推宋代二者存在方言同源关系。

6. 结语

综上所述，就现有史料而言，魏了翁在靖州六年谪居，其语言背景对靖州方言形成产生实质影响的可能性较低；其讲学与著述的作用，更可能限于流寓士人阶层的“文读层”，对基层社会的语言根基触及有限。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多层次考察。其一，靖州州城规模狭小，境内存在服饰、族称可辨识的非汉族群且习俗长期延续，州城之外的乡村户口占绝大多数；鹤山书院的受众以湖湘江浙流寓士人为主，本地子弟可考者寥寥，对基层族群的覆盖范围有限。其二，魏了翁谪居靖州仅六年，对于语言的结构性变迁而言时间极为有限；后世酸汤话等混合语的形成过程，也提示边地语言接触更可能是双向调适而非中原汉语的单向替代。其三，就魏了翁本人的语言背景而言，其母语可能带有蒲江一带留存的宋元古蜀方言（南路话底层）特征，与以汴洛中州音为基础的通语音系存在差异，未必具备推广标准通语的天然语言基础。其四，靖州与四川今日同属西南官话的分布格局，是明清湖广移民背景下官话平行扩散的晚近产物，不宜倒推宋代两地存在方言同源关系。

魏了翁靖州六年的著述与讲学，是南宋理学史与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其培养流寓士人、校勘儒家经典、推动湘蜀文化交流的贡献本身已足够厚重，不必附会为超出其历史角色的语言影响。澄清这一问题，并非低估魏了翁的历史地位，而是试图将相关讨论拉回具体的历史语境，避

免以今律古的过度阐释；同时也应承认，由于史料限制，本文对魏了翁语言背景与靖州方言形成之间关系的判断仍带有推断性质，尚待更多地方文献与语言史证据的检验。

参考文献

崔荣昌. (1985). 四川方言的形成. 方言, (1), 6-14.
崔荣昌. (1996). 四川境内的湘方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洪迈. (2005). 容斋随笔. 中华书局.
胡萍. (2007). 湘西南汉语方言语音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蒋菲. (2021). 魏了翁与湘学之关系. 怀化学院学报, 40(1), 73-78. doi.org/10.16074/j.cnki.cn43-1394/z.2021.01.015
雷昌仁、周悦伊. (2023 年 8 月 7 日). 湖南靖州：阐述“魏了翁”文化 传承湘学经典. 央广网. https://www.cnr.cn/hunan/zhxw/20230807/t20230807_526368991.shtml
李伟. (2007). 贬谪流放文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82-85, 93.
刘晓南、罗雪梅. (2004). 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79-88.
陆游. (1979). 老学庵笔记. 中华书局.
龙耀宏. (1991). 侗水语关于汉语“官”的称呼来源于楚语“莫敖”考. 民族语文, (4), 68-70.
平田茂树. (2022). 宋代政治的空间与结构：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研究. 浙江古籍出版社.
千年飞山. (2024 年 1 月 3 日). 靖州话为什么那么好听? https://mp.weixin.qq.com/s/pTgbcVJQNHN0eUq28PuMSw
瞿建慧、谢玲. (2011). 湘西南酸汤话的演变与归属. 贵州民族研究, 32(6), 181-184. doi.org/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1.06.003
脱脱, 等. (1985). 宋史. 中华书局.
王恩涌、赵荣, 张小林, 等. (2000). 人文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启涛. (2024). 宋朝通用语言文字史论考. 中国语言学研究, (2), 214-314, 2, 321-322.
魏了翁. (1989). 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景宋本). 上海书店.
叶蜚声、徐通锵. (2010).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尹海江. (2010). 春风沂泗俨在此，居人莫作渠阳看——魏了翁贬谪靖州期间的生活治学及创作. 怀化学院学报, 29(6), 40 – 42.doi.org/10.16074/j.cnki.cn43-1394/z.2010.06.022
周及徐. (2012).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语言研究, 32(3), 65-77.
周振鹤、游汝杰. (1985). 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 方言, (4), 257-2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 商务印书馆.

【基金声明】本文为 2026 年度观筑山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文化旅游研究院地方文化研究专项重点项目“湖南靖州语言与地域文化”（项目编号：GZSS2026DFWH001）阶段性成果。

【利益冲突声明】本研究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作者审阅并同意提交本文，并对研究贡献负责。

【伦理审批及知情同意声明】本研究未涉及人类受试者，因此无需开展机构伦理审查及知情同意程序。

【作者简介】赵律言（1999 – ），硕士，观筑山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文化旅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兼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湘西南语言与地域文化，E-mail：zlvyan516@163.com。